

日常反抗與權力角逐

——評王笛《那間街角的茶鋪》

● 吳曉璐

王笛關於成都茶館以及成都的微觀世界相關研究，聚焦於公共空間及其中的權力結構，尤其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信息流動與交換，是如何影響權力結構的。新作《那間街角的茶鋪》在史料、寫作方法和研究方法上有所推進。



王笛：《那間街角的茶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

王笛新作《那間街角的茶鋪》（以下簡稱《茶鋪》，引用只註頁碼），前承他此前的微觀研究，在史料、寫作方法和研究方法上有所推進。王笛關於成都茶館（又稱「茶鋪」）

以及成都的微觀世界相關研究，聚焦於公共空間及其中的權力結構，尤其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信息流動與交換，是如何影響權力結構的①；而公共領域是茶館研究中一個重要的研究視角。受到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關於「公共領域」的理論影響，中西學者都從不同角度對公共領域有所討論。李金鉉主要討論了中國近代報刊是否對公共領域有所促進的問題②。羅威廉（William T. Rowe）將視角延伸到「一個能容許有地方產權的公共領域在〔清〕帝國晚期開始存在」的話題③。而關於社會中的信息流動，則有姜士彬（David Johnson）討論了明清社會的「信息溝通方式與權力結構如何影響人們的意識」④。日常生活史則有更多學者關注，如盧漢超關於二十世紀初上海的研究⑤。上述論著與王笛的研究旨趣可謂一脈相承，展示了近年來史學界的文化轉向。

《茶鋪》從茶館中更為微觀的各種細節入手，以反映日常習慣如

何形成一種社會力量。全書共計六個部分，可以看成是三大範疇：第一部分「成都是個大茶鋪」可視為緒論，為了引出研究問題和研究視角的開端，點出成都茶館之於當地社會結構中的重要角色；第二至五部分按時序敘述清末、抗日戰爭前、抗戰期間、國共內戰中的成都，分析部分具體研究了茶館的功能、公共空間的角色、茶館中的人（如顧客、工作人員）等與茶館相關的微觀細節，以及茶館如何受到外部力量的左右；最後一部分「茶鋪是個小成都」則是總結與對比。

一 為甚麼又是茶館？

第一部分在全書中所佔之比例較少，雖然只有短短六十幾頁，但是其重要性卻遠遠超出其比重：王笛相當於回顧了自己數十年的學術生涯，以及自身對於微觀史學、物質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的理解。

不同於一般學術專著的開端、緒論，總是洋洋灑灑地梳爬文獻，由此引出研究主題，本書另闢蹊徑，將作者自己的學術人生放到研究中，從而更為具象地展示了其研究對象：日常生活與物質文化。王笛從幼時在成都居住的生活經歷開始談起，引出茶館對於成都本地人的重要性：「坐茶館」既是生活習慣，更是一種隱藏的文化行為方式，並且是從小開始的長期行為，這也為後文分析茶館的功能與作用，例如作為幫助調解糾紛的「民事法庭」（頁120-21）、「袍哥」（四川哥老會）的「公口」（指活動據點，頁114）等，埋下了伏筆。成都茶館

看似類近於西方的咖啡館、酒吧，同為普通人閒暇時刻打發時間的場所、人際交往的公共空間（頁12）。王笛通過本人在中美兩國的生活經歷，解讀成都茶館如何融入生活。王笛的生活跨越了中美兩種文化，因而更能從跨文化的角度理解日常差異。

王笛正是通過這樣跨文化的對比方式，引出了其研究的視角和方法。《茶鋪》的敘事被放在物質文化史的視野下，蓋因茶館本身乃是非常具象的物質載體，與茶館相關的茶具（茶碗、茶蓋、茶船〔頁37〕）、店名（「力圖高雅和自然，諸如『訪春』、『悠閒』、『芙蓉』、『可園』等」〔頁33〕）、地理位置（「竭力擇址在商業或有自然或文化氛圍之地」〔頁33〕），乃至茶館裏使用的熱水（為節省柴火，不少成都市民直接從茶館購買熱水〔頁31〕）、熱水瓶（抗戰勝利後不少茶館引入熱水瓶，不再燒開水泡茶〔頁47-48〕），都是微觀史學青睞的研究對象。它們反映社會中很多深層次的運作模式，如茶館的資金與商業運作模式、茶館中的性別因素、外部力量對於茶館的影響、國家與地方的權力鬥爭等。

從這個視角出發，本書一開始就回答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對於茶館的研究，有何必要？這正是日常生活史的魅力所在：從看似不起眼的小事物入手，挖掘其深層次的文化意涵：日常生活中的習慣、人際關係等因素，反映出社會結構如何構成及其背後的運行邏輯，人們如何在這種社會結構下找到生存之道、解決糾紛方法，以及當這種既有的社會結構遇到外部力量（例如

從微觀史學視角出發，本書一開始就回答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對於茶館的研究，有何必要？這正是日常生活史的魅力所在：從看似不起眼的小事物入手，挖掘其深層次的文化意涵。

為甚麼普通民眾要去坐茶館，這種行為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這是本書的研究重點所在。民眾在茶館裏調節糾紛、交換商業消息，也交流各種觀點。他們可以通過閒談甚至是「饒舌」來完成自己的觀點塑造，進行「日常反抗」。

改良運動)的挑戰時，會出現甚麼變化及其「紅線」所在。這在司昆倫 (Kristin Stapleton) 研究周善培於成都實行新的警政後普通人時而支持、時而反對的複雜反應，就可見一斑^⑥。

這樣的研究方法，其實已經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成果，特別是在社會學領域，例如斯科特 (James C. Scott) 的《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研究的就是馬來亞農村的農民在國家機器的壓力下，如何以非直接的方式逃避國家監管^⑦。《茶鋪》一書也回應了斯科特的觀點，認為茶館就是這樣的「弱者的武器」：「在過去的50年裏，他們所光顧的茶館，他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坐茶館生活習慣，竟一直是國家權力與地方社會、文化的統一性和獨特性較量的『戰場』。他們每天到茶館吃茶，竟然就是拿起『弱者的武器』所進行的『弱者的反抗』。」(頁9-10) 茶館本身並不能讓人反抗，產生社會力量的是普通人在茶館中的活動，是與茶館相關的一些民間習慣。

為甚麼普通民眾要去坐茶館，這種行為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這才是本書的研究重點所在。王笛指出，一些傳統習慣，包括成都的坐茶館，是普通民眾逃避現代化管理的最佳空隙之處，是對「為名忙，為利忙」的現代生活進行無聲反抗的最佳手段(頁26-27)。在國家力量未能下達的街市，民眾在茶館裏調節糾紛(由地方勢力主導)、交換商業消息，也交流各種觀點，形成信息的傳播。他們可以通過閒談，甚至是「饒舌」(散布謠言)來完成自

己的觀點塑造，並形成一種表達方式，進行「日常反抗」(頁226)。民國時期，政府欲將權力逐漸滲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於是國家、地方、精英勢力等開始在一方小小的茶館中角力。這些情況尤其發生在轉型時期的近代中國，亦即本書的主要研究時段：清末到共和國建立之前(1900-1949)。這樣一來，本書的研究視角及意義就非常明顯。

二 公共史學與微觀史學的結合

在學術書籍的背頁，一般會刊出一些學界「大咖」對於這本書的簡要評價：既能表達該書在學界的重要性，也能通過專家言簡意賅的解讀闡述該書精妙之處。王笛作為近代史研究中運用微觀史學進行研究的大家，沒有邀請知名學者來為《茶鋪》做短評，而是在背頁寫道：「這本書也是繼續實踐『為民眾寫史』這個歷史使命。」這也點出了本書在寫作手法上的一個新的嘗試：「為民眾寫史」，或曰，寫普通大眾能讀懂的歷史。這是從「寫民眾的歷史」到「為民眾寫史」的一個標誌性轉變。

「寫民眾的歷史」是微觀史學研究的主旨，以自下而上的視角，跳出傳統史學研究將目光聚焦於知名的政治人物、重大的歷史事件等宏大敘事之外，以散落的普通人的歷史，透視出其背後深層次的社會變遷。蓋因這類「無名之輩」看似在歷史上沒有留下自己的聲音，日常瑣事也似乎過於零散而漫長，作者坦言，「天天在茶館裏聽講評書的

說歷史，人們津津樂道的『二十四史』，汗牛充棟的其他官方記錄，哪裏不是帝王將相、英雄人物的歷史？小民百姓是不會有一席之地的」（頁9）。但是歷史沒有留下聲音不代表人們沒有發出聲音，不代表沒有引起影響，只是囿於各種因素限制，他們的聲音沒有「被聽到」，日常的影響沒有「被看見」而已。

「寫民眾的歷史」在近代史研究中已不鮮見。這個以往沒有被看見的群體，在近年來興起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中，成為了學者關注的焦點。學界也出現了一批研究成果，雖然寫的是底層人們的日常，但是閱讀的對象顯然仍然不是這些被「再關注」的群體：以學術成果面貌問世的作品，其受眾必然被「窄化」為研究者，或是有一定專業知識的受眾。

《茶鋪》的「為民眾寫史」，則將閱讀群體的範圍「寬化」到普通人，這對於嚴肅的史學研究來說還是比較少見的，本書是一個很好的公共史學的實踐化嘗試，對史學界本身就有很大的示範作用，有望帶來影響和改變。以往曲高和寡的史學研究，只是將學者數年來孜孜以求的史料、研究心得呈現給少數專業人士，而更多的研究無法在社會上產生影響：艱澀的理論和大段的檔案史料，讓普通人難以深入接觸，尤其是在當下文化快銷產品頻出的網絡時代^⑧。史學的任務和研究視野，本來就是要關注不同時段的社會變遷及其影響。面對當下新媒體、串流媒體對於日常生活的衝擊，史學界要如何因應網絡時代的挑戰？傳統的學術論文固然嚴謹、深刻，但是能不能在新時代裏發揮

更大的社會影響？尤其是在教育程度日益提高、受眾對於更高品質的閱讀產品有所需求的時代。這也是對當下人文科學學術成果進行社會化轉化的一個推動力。

誠然，若干年前借助電視媒介，史學已經開始進行通俗化的嘗試，出現了現象級電視節目《百家講壇》，並捧紅了一批學者明星。然而從更深層的文化角度看來，這更像是一場電視「狂歡」，獲利方大概只有兩方：電視媒介和通過媒介成為「名人」的學者。值得反思的是，這一次通俗化的嘗試，真正對史學界的影響何在？「非虛構類」歷史作品一直以來都是受眾接受程度比較高的一種通俗化體裁^⑨。從前網絡時代借助電視等媒體興起的各種節目及其衍生產品、書籍的暢銷，就能很好地看出這一點。但是這不能算是一種獨立的、來自史學界自身內部變革意識的推動，只能算是電視節目的副產品——本質上，哪種類型的產品，哪個時代、哪個學者的作品能夠借助電視取得成功，其選擇權並不在史學界及學者手中，而是在於媒介平台，亦或是受眾，只不過受眾的意識通過平台對於學者、體裁、內容的篩選呈現出來。而王笛等人的公共史學實踐，則是歷史學者自身有意識地面向社會受眾進行的知識再生產與傳播活動，如何選擇、選擇甚麼、對預期效果的評估，都是由學者自己進行判斷、篩選。

如作者在訪談中談到本書的寫作動機：「去茶館裏採訪茶客。其中大量的具體細節和生動故事無法用在學術專著或論文中，很多邊角餘料只能躺在電腦裏面，或者藏在

「寫民眾的歷史」在近代史研究中已不鮮見，但其受眾必然被「窄化」為研究者。《茶鋪》的「為民眾寫史」，則將閱讀群體的範圍「寬化」到普通人，這對於嚴肅的史學研究來說比較少見，本書是一個很好的公共史學的實踐化嘗試。

王笛以「我」的角色出現在自己的學術著作當中，以「我」的回憶為線索，把這些史料串聯起來，藉兒時經歷開啟了關於茶館的回憶，這類特別的寫作手法——以「我」入史，讓人耳目一新，是公共史學很好的範例。

書房的角落中……才有了眼下這本新書。」^⑩因而，通過公共史學達到向教育程度已然提高的大眾傳播最新學術成果的目的，乃是史學界內部推動的一種因應時代變革的舉措。這也是本書在寫作手法上創新的亮點之一。

本書在材料的選取上也有一定的新意。茶館這個研究主題，注定了其所選取的史料，類型一定不止於正式的官方檔案。作為一個受過嚴格歷史學術訓練的學者，王笛使用的材料還是立足於官方檔案。他在檔案中找到很多關於茶館的記錄，尤其是在警察局檔案中。因為茶館作為公共空間，也作為「袍哥」的「碼頭」、「公口」，時有打架鬥毆等情況，所以茶館以一種特殊的形式出現在正式的官方檔案之中：「查煙、茶、酒館及會場人眾處所，如有三五成群、氣象兇惡、行止張皇、衣服奇怪者，巡兵即須尾隨其後，聽其言論述其所至。」（頁110-12）除此之外，對於清末和民國早期的茶館的描述，還出現在各種地方文學作品、報紙之中，因此王笛也大量引用各種小說（頁57-58）、竹枝詞（頁16-18）等文學作品中關於茶館的描述，來觀察茶館的面貌，而這些相對輕鬆的史料，正好切合本書公共史學的寫作目的。

當然，無論是文學作品還是大眾傳媒提供的史料，在史學研究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史、社會史研究當中已經屢見不鮮。本書對於這些史料的組合運用，卻呈現新意。王笛以「我」的角色出現在自己的學術著作當中，以「我」的回憶為線索，把這些史料串聯起來，這正是本書的獨特之處。「梓潼橋就有一間茶鋪。

那裏總是座無虛席，煙霧繚繞，人聲鼎沸……那就是我一生中不斷在我的腦海裏出現，反覆進入到我的夢中的那間街角的茶鋪。」（頁7）娓娓道來的兒時經歷，開啟了本書關於茶館的回憶，這類特別的寫作手法——以「我」入史，讓人耳目一新，是公共史學很好的範例。

三 研究範疇、概念與寫作手法的商榷

（一）甚麼應該包含進茶館研究？

雖然全書在研究視角、寫作手法上讓人耳目一新，但是仍然有一些可以討論的地方。本書的研究對象當然是成都的茶館。然而如何界定研究對象的範疇？茶館功能比較多元，除了賣茶之外，裏面還有很多別的生意買賣，與後世出現的專門的戲院、飯館、交易所等確實有不少交集。

本書觀察到依附於茶館為生的人物和小生意，例如等待「接活兒」（如修傘、修帽）的各種工匠，以及售賣各種商品食品的小販，甚至租借熱臉帕、水煙袋服務，等等（頁148-53）。這些工匠與小販作為個體經營者，是零散的個體，不涉及到組織的運行。他們基本上是以出賣自身的勞動力和服務為主，在茶館裏工作只因為茶館是當地文化中的公共空間，在這裏能夠更好地「接活兒」而已。因此，將之涵蓋在茶館作為一種公共空間的研究中，非常能夠體現出茶館的公共性。

然而，當這些具有別的功能的公共空間，成為了專業化程度較高

的另外一種場所之後，還能不能把其涵蓋入茶館研究？例如，戲園子類型的「茶館戲園」（茶園），能否算是茶館的一種？或者兼賣熟食的茶鋪，是否也可以被涵蓋？作者指出，在近代化早期，各種社會娛樂模式尚處於萌芽之中，因而戲院、茶館確有重合之處：很多茶館之中有戲班子搭台唱戲，而慢慢演化成專門的戲院。戲院、茶館看起來是相互相容的。王笛用上不少篇幅，討論了茶館（包括一些大型茶鋪）中的戲曲表演（頁93-96）。這些戲曲表演當然應該被包含在茶館研究之中，它體現了茶館作為公共空間的其中一項屬性：大眾教育（頁98-101）。

但是，近代成都漸漸形成一些專業化的娛樂表演場所，例如「書場」、「戲園」。如果這種專業化的表演場所已經形成固定的節目和表演，那麼進入這些場所消費的顧客，其目的也不盡相同，如1908年悅來茶園建立之後，本地知名川劇團三慶會長期於此駐演^①。這就意味着這類公共空間如何被普通人所使用，已經與普通茶館有所不同了。顧客需要在特定的時間欣賞表演，或是專門為了支持某個演員前往，這與尋常茶館中顧客閒遊的性質大相逕庭，也與茶館中臨時性質的表演不同。這類演出場所一旦成熟並形成自己的專業空間，其組織運行原則、目的、性質等均與普通茶館相異。戲迷與茶客之間也存在明顯的差異，不能都以消費者一概而論。因此筆者認為，當戲園的專業化達到一定的高度時，對於此類戲園與茶館之間的界限是不是應該釐清？茶館研究的關切似乎不應過廣。

（二）公共空間中的微觀與宏觀

王笛的茶館研究，更多地關注了茶館內一些細節，例如茶碗、店名、熱水等。誠然，本書本就是微觀史學的研究，關注微觀與細節不足為奇，但微觀史學指的僅僅是研究對象的微觀，還是隱藏於日常行為之後的深度社會影響？是否只研究社會性的問題，而忽略宏大（政治性）的問題？因此，即便是進行微觀史學研究，也不能只是着眼於瑣碎的細節和零散的對象，而應該從社會意義的角度去理解歷史。

本書中關於茶館的研究，似乎就將微觀的概念窄化，只關注於一些零散、看上去「微觀」的對象，而對於一些關於茶館更為宏觀的信息，例如茶館的建築、文化風格等，卻少有描述。其實，公共空間的建築本身非常值得注意。如前所述，作者認為茶館和咖啡館有相似之處。但是，舊式的茶館建築與新式的咖啡館建築，在文化意涵和象徵物上就大有不同，兩者不僅代表了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更代表兩種消費模式和生活行為，乃至於使用者不同的階級背景。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咖啡館有吧台設計，店員在消費者面前製作咖啡，通常由店員和少數顧客互動，氛圍趨向寧靜、高雅。而成都茶館沒有此類設計，卻有令人眼花繚亂的「茶博士」用長嘴茶壺為客人進行遠距離斟茶的表演，這種表演甚至成為成都茶館一絕：「成都人就有這個怪脾氣，清靜的茶鋪他們會懷疑生意不好，留不住客，越擁擠他們越要去，覺得這個茶鋪一定是好茶鋪。」（頁79）這種空間陳設不同帶來的

當具有別的功能的公共空間成為了專業化程度較高的另外一種場所之後，還能不能把其涵蓋入茶館研究？例如，戲園子類型的「茶館戲園」，能否算是茶館的一種？或者兼賣熟食的茶鋪，是否也可以被涵蓋？

作者大量使用描述性的材料，尤其是文學作品、新聞等，除了第一部分中交代了一些論點，並引述了一些社會學的原理之外，本書其餘部分大量引用當地的市井新聞、文學作品，但卻未能將這些材料進一步進行「深描」和分析。

服務差異，對於茶館消費的影響何在？

喝茶是可以續水的，因此一壺茶可以喝很久，「在茶館裏坐一日，若僅只喝一壺茶，所費不過一百或二百文……『虛耗時間』幾個字，在這裏是很少有人道及的」（頁146）。但是咖啡不能續水，只能一飲而盡，否則就要再買。那麼，從在公共空間中逗留的時長來看，茶館與咖啡館就存在時間差，兩者的異同對於日常生活與習慣的形成，又有哪些影響？類近的公共空間，但是飲料和消費習慣差異之處所導致的結果是顯著的，這似乎也是值得思考的方向。

從茶葉的種類與咖啡豆的產地，也可以考察出消費者的行為、背景。四川是知名的茶葉產地，是「茶馬古道」的重要節點，也是茶葉輸往西藏、雲南等地的經銷要地，「明代和清代川茶便銷到蒙藏地區，在嘉慶時期，川茶銷售藏族地區佔百分之九十以上」（頁29），因此本地的茶葉類型也相當豐富。書中提到，「民眾間的衝突一般不到官府解決，而是去茶館調解」（頁119），「袍哥」主持「吃講茶」，吃的是普羅大眾都能承擔的老蔭茶，還是文人雅士的茉莉香茶？是細品還是牛飲？吃茶儀式是如何滲透在糾紛解決中的？似乎也是作者沒有關注到的方面。

（三）何謂「公共史學」？

誠然，「為民眾寫史」的目的和思路讓人耳目一新，但是如何真正做到通俗傳播？怎樣才能算是創立了一種新的「為民眾寫史」的寫作

模式？僅僅是把艱澀的理論與分析減弱或是去掉嗎？就史學界的嘗試而言，所謂的「公共史學」實際上可以被視為科學的傳播技術在史學界的一種嘗試。然而，如何真正形成新的知識傳播形式，並能夠為變化中的受眾所接受？過多的註釋、分析，固然會擾亂讀者的思考，進而造成棄讀率的上升，但是過於簡化則會使作品陷入描述性材料的堆砌，而與一般的歷史讀物拉不開水平差距，使讀者的期望值下降，形成「不過如此」的印象。

因此，如何把握難易的平衡，是對當代專業學者的一種考驗。《茶鋪》一書似乎也繞不開這個如何把握難易界限的難題。為了達到通俗化，作者大量使用描述性的材料，尤其是文學作品、新聞等，除了第一部分中交代了一些論點，並引述了一些社會學的原理之外，本書其餘部分看上去全是各種文學資料的堆積，比如大量引用當地的市井新聞、文學作品，但卻未能將這些材料進一步進行「深描」（thick description）和分析。而起到提綱挈領作用的「研究內核」反而不夠清晰，若隱若現地散布在各個章節之中；讀者一不留神，還會漏掉這些重要的信息。

此外，即便是公共史學，「公共」的概念仍需要釐清：公共史學當中一部分受眾喜歡，另一部分不感興趣，這樣的史學還能算是「公共」嗎？或者直接面向一個潛在但有邊界的閱讀群體，例如「受過高等教育」、「文科背景」、「四十歲以下」，等等，透過標籤來圈定讀者，以便為更為細分的讀者群提供有深度的史學通俗類讀物？畢竟「公共」

不等於「全部」，一本書也不可能面向所有的讀者。能夠做到為「公共」中的某個群體提供與之匹配的讀物，已經算是成功的傳播了。本書在寫作上就存在上述受眾界定不清晰的情況，寫作一味迎合所有「想像中」的可能讀者，試圖形成「深入淺出」的模式，但是讀起來卻給人感覺材料零散，結構性不強；試圖「深入」的「論點」、「理論」散落在各個不起眼的角落，而「淺出」的部分太多、太雜，使得這樣的史學作品（即便是公共史學的作品）與文學創作拉不開距離，卻又沒有文學創作的戲劇衝突與複雜的語言構造。因此，「為民眾寫史」的出發點雖好，但是如何能夠成為當代受眾接受的史學作品？如何能有效地傳播？這是公共史學實踐中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四）「弱者」的定義

本書大量運用社會學的相關理論，尤其是斯科特之《弱者的武器》。王笛將民眾在茶館中消磨時間、習慣於在茶館中處理各種社會事務這種行為，視為一種對國家權力的反抗。而斯科特指出：「反抗的日常形式與那些更為激進的公開對抗方式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旨在減少或拒絕來自上層階級的索要或者對上層階級提出自己的要求」，「此處日常反抗與其他形式的反抗最明顯的不同在於它不承認有公開的和象徵性的目標」^②。根據這個理論，王笛指出坐茶館活動的其中一部分與地方政治相關，可以說就是「反抗的日常形式」，即不是用直接反對、暴力起義等模式進行，但

是能表達出隱蔽的反抗意識，並為此爭取實際的物質獲取的行為。當然，成都的茶館行為與斯科特表述的民眾反抗行為有相似的地方。

然而，從「弱者」的日常反抗來講，坐茶館與斯科特所描述之馬來亞農民的活動也有很大不同，主要就是精英對這些日常活動的影響。那麼，在成都的茶館裏，有沒有所謂「精英」構建的價值體系對「弱者」的影響，而影響幾何和有多深呢？其實中國的「弱者」不一定是指行為上的「弱者」，而是指代廣大的「庶民」，他們或者有各種各樣的關係網或「門路」，而且精英與庶民的邊界並不是那麼明晰，也是經常變動的：可能在這個事件裏，保長代表權威，但是在那個事件裏，他卻又是庶民。這是不是與斯科特筆下之馬來亞農民有所不同呢？

坐茶館與斯科特所描述之馬來亞農民的活動有很大不同，主要就是精英對這些日常活動的影響。在成都的茶館裏，有沒有所謂「精英」構建的價值體系對「弱者」的影響，而影響幾何和有多深？

四 結語

霍布斯鮑姆(Eric J. Hobsbawm)在研究民族與民族主義時，探討了為甚麼「短缺經濟」體制下的人們會習慣於依附族群：「在這種經濟制度下，族群就像親屬和其他互惠式或依附式的網絡一樣，原本就具有比較高的凝聚功能。」^③從一定程度上來講，成都的茶館不僅僅是一個在實體上的公共空間，更類似於這種「互惠式」或者「依附式」的社會網絡，具有社會凝聚功能：作為個體的成都普通人，能在日常生活中的茶館裏解決問題，得到好處，久而久之就將茶館作為依附的主要力量；而茶館也因為能幫普通人解決問題，乃至於牽涉到各方力量在其

成都的茶館不僅僅是一個在實體上的公共空間，更類似於「互惠式」或者「依附式」的社會網絡，具有社會凝聚功能。茶館在社會中的重要性愈發提升，逐漸成為成都市民生活當中最為重要的社會網絡。

中角逐，因而在社會中的重要性愈發提升，並逐漸成為成都市民生活當中最為重要的社會網絡。

這種以茶館為節點的社會關係網絡，成為本地人倚重的重要社會資源，使得成都乃至於川渝文化覆蓋的整個地區，有別於其他地區人們所依賴的社會網絡、社會文化（如華南的宗族等），逐漸與其他地區形成鮮明的差異性。正如霍布斯鮑姆所言之「被發明的傳統」，很多長期以來被認為理所當然的傳統，實際上是晚近才形成的^⑭。王笛也指出：「有時候我們認為自己有很長歷史的所謂傳統，其實進入我們生活的時間並不長，有許多所謂的傳統是現代才創造的。」成都的茶館同樣如此：「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現代概念的『茶館』在成都並不十分普遍。」（頁19）這也是本書的魅力所在，通過對清末到建國前茶館的研究，可以看出這種「傳統」是如何發明的：這其中不光是茶館和日常生活的變遷，更是社會網絡結構、力量的變化，最後形成了成都以至川渝地區顯著的社會文化——茶館文化。

註釋

① 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Di Wang, *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 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 1950-200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② 李金銓：〈過度闡釋「公共領域」〉，《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8年12月號，頁122-24；〈報人情懷與國家想像〉，載《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頁1-46。

③ 羅威廉(William T. Rowe)：〈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載伊沛霞、姚平主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思想文化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371-94。

④ 姜士彬(David Johnson)：〈明清社會的信息溝通方式、階級與意識〉，載《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頁277-321。

⑤ 盧漢超著，段煉、吳敏、子羽譯：《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

⑥ 警察制度作為一種新型社會管理機制，不僅提供一種新秩序，而且在日常生活中重塑人們的「價值觀」。參見司昆侖(Kristin Stapleton)著，王瑩譯：《新政之後：警察、軍閥與文明進程中的成都(1895-1937)》（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20）。

⑦ 斯科特(James C. Scott)著，鄭廣懷、張敏、何江穗譯：《弱者的武器》（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⑧⑨⑩ 王笛、許紀霖：〈文史一家：非虛構文學和公眾史學的時代降臨了〉（2023年9月11日），澎湃新聞網，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564414。

⑪ 李陽、杜翊：〈悅來茶園與清末民初成都演劇考述——以《娛閑錄》為考察中心〉，《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23年第2期，頁67-74。

⑫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頁39。

⑬ 霍布斯鮑姆(Eric J. Hobsbawm)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頁278。

⑭ 霍布斯鮑姆：〈導論：發明傳統〉，載霍布斯鮑姆、蘭傑(Terence Ranger)編，顧杭、龐冠群譯：《傳統的發明》（南京：譯林出版社，2020），頁1。